



教育人力资本、企业所有制与 农民工社会保障获得

秦立建 杨 倩 陈 波

摘 要:对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进行的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农民工获得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具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第一,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获取能力。第二,接受过职业培训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保率。第三,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覆盖率。这些结果说明农民工不再仅仅是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被动接受者,在获得社会保障项目时已经具有一定的主动权。因此,在加大推进不同所有制企业为农民工购买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同时,也应该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以增强农民工对于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获取能力。

关键词:教育人力资本;企业所有制;农民工;社会保障

一、引 言

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工进城务工,大多从事就业环境较差和稳定性较低的工作,面临的市场风险较大。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能够减轻农民工所面临的就业或创新限制,激发农民工的创业热情,从而有助于改变个体的境遇。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城乡二元社会福利体制,导致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大量缺失,不利于全国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Cheng, et al., 2014:243),国家于2007年实施了新《劳动合同法》,要求用工单位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使农民工与城镇户籍职工一样,获得了平等的劳动权利。然而,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还比较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课题组,2013:1)。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教育人力资本和单位所有制性质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教育人力资本代表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的主动性,单位所有制性质代表农民工获得社会保障的被动性。对于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农民工是主动的参与者还是被动的获得者?即农民工的教育人力资本影响其参保,还是单位所有制性质影响其参保?抑或其他因素影响其参保?上述问题对于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和统一劳动力市场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学者对我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Nielsen等认为,企业所有制类型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Nielsen, et al., 2007:29; Smyth, et al., 2009:512; Cheng, et al., 2014:243)。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还存在严重的地域歧视,本地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好于外地农民工(Knight & Gunatilaka, 2010:113; Akay, et al., 2013:1; Wang, et al., 2013:78)。王震、王冉和盛来运以及郭菲和张展新发现企业所有制性质显著影响农民工获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王震, 2007:61; 王冉、盛来运, 2008:26; 郭菲、张展新,

2013;29)。但是基于武汉市的调查,韩俊强发现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并没有显著影响(韩俊强,2013;57)。郭瑜、张国英和吴少龙发现教育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而对参加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没有影响(郭瑜,2011;42;张国英、吴少龙,2012;88)。胡央娣和孟颖颖则发现教育水平对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没有影响(胡央娣,2013;105;孟颖颖,2011;159)。彭佳芳、郭菲和张展新进一步发现,企业普遍存在少投和漏投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问题,仅允许农民工参加一项或者两项社会保险(彭佳芳,2009;65;郭菲、张展新,2013;29)。朱玲、郭林和熊波认为,应该加强政府的责任,做好农民工社会保障项目的顶层制度设计,以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朱玲,2010;2;郭林、熊波,2014;126)。

已有文献为笔者深入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仍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研究样本的代表性不足。大多数研究的调查取样区域仅为一个或者几个城市,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不仅不具有普遍的全国适用性,而且也不具有可比性。第二,研究的社会保障项目较少。大多数研究仅检验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社会保障项目,而鲜有将“五险一金”全部保障项目纳入研究范畴,无法展现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综合状况。第三,鲜有文献将教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制类型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这些文献或者仅检验教育人力资本的作用,或者仅研究企业所有制类型对农民工社会保障获得的影响。第四,没有解决社会保障参保与收入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努力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贡献:第一,使用全国性大规模的调查数据,研究样本具有良好的全国代表性;第二,将“五险一金”的所有保障项目纳入研究范围,全面考察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保情况;第三,将教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制类型统一纳入分析框架,使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第四,使用工具变量法尝试解决参保与农民工工资收入的内生性问题,提高计量估计结果的有效性。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由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提供。调查范围涵盖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选取106个城市。采取三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随机选择调查样本。调查对象是在本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年龄为16~59周岁的外来流动人口。所有的调查员都经过严格的国家级培训,培训合格的人员才能正式参与现场调查。每一个样本街道(乡、镇)设置一个督导员,负责该区域现场调查工作的检查、验收和处理现场调查员遇到的问题,并随机抽取5%的个人调查表进行复核,进行调查质量的监控。入户调查前的2~3天,现场调查员与被访者取得联系,约定入户调查的时间。共调查122 670个外来流动人口,包括105 620个农村户籍迁移者、17 050个城城流动人员。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将操持家务和在读学生的观测值去掉,仅保留以就业为迁移目标的观测值,本文最终使用的观测值数量为86 426个。

本文研究的社会保障均为农民工打工城市提供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本文将社会保障定义为,“五险一金”至少获得其中之一者,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则获得者赋值为1,否则为0。如表1所示,有16.64%的农民工享有至少一种社会保障项目;在分类别的社会保障项目中,拥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三大类保障项目的农民工的比例,分别为15.35%、14.09%和10.40%;而拥有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农民工的比例分别是6.36%和4.38%,拥有住房公积金保障项目农民工的比例仅为1.27%。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障项目的参与比例都比较低,说明农民工整体的社会保障获得状况较差。男性农民工的比例达到59.09%,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及之后出生)的比例为40.06%。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工的比例达到78.39%,而大专及以上学历农民工的比例仅占3.25%,接受过职业培训农民工的比例仅为12.73%,说明农民工的整体教育人力资本状况较低。在国有单位就业农民工的比例为3.58%,港澳台、日韩资、欧美国家和中外合资企业就业的比例仅为4.91%,而在个体工商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农民工的比例高达80.21%,说明农民工主要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工作的稳定性较差。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 1 本文使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均值或百分比	标准差	变量名	均值或百分比	标准差
因变量（分类变量）	(%)		中外合资企业	1.74	0.13
社会保障	16.64	0.37	其他类型企业	9.22	0.29
养老保险	15.35	0.36	行业		
医疗保险	14.09	0.35	制造业	23.64	0.42
工伤保险	10.40	0.31	建筑业	8.68	0.28
失业保险	6.36	0.24	交通运输通讯业	4.28	0.20
生育保险	4.38	0.20	批发零售业	24.52	0.43
住房公积金	1.27	0.11	住宿餐饮业	14.34	0.35
自变量（分类变量）	(%)		社会服务业	13.46	0.34
性别（男性=1,女性=0）	59.09	0.49	文教科卫体党政	2.61	0.16
新生代（新生代=1,老一代=0）	40.06	0.49	其他行业	8.46	0.28
教育程度			打工城市类型		
小学及以下	16.97	0.38	省会城市	57.67	0.49
初中	61.42	0.49	地级市城市	38.37	0.49
高中	18.36	0.39	县城城市	3.96	0.19
大专及以上	3.25	0.18	迁出地		
职业培训	12.73	0.33	西部地区	30.62	0.46
婚姻状况（已婚=1,其他=0）	78.19	0.41	中部地区	43.63	0.50
合同（签订合同=1,否=0）	25.66	0.44	东部地区	25.75	0.44
单位性质			打工所在地		
国有单位	3.58	0.19	西部地区	26.72	0.44
个体工商户企业	48.24	0.50	中部地区	25.51	0.44
私营企业	31.97	0.47	东部地区	47.77	0.50
集体企业	2.08	0.14	自变量（连续变量）	均值	
港澳台企业	2.09	0.14	月工资(元)	2649.88	6841.07
日韩资企业	0.84	0.09	往家乡汇款(全年汇款金额元)	2958.14	5056.26
欧美国家企业	0.24	0.05	外出迁移时间(年)	4.62	4.70

注:社会保障变量的定义是,“五险一金”至少有其中一种者为 1,全部没有为 0。

表 2 是不同教育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拥有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差异比较。从教育程度来看,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程度越高,则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率也越高。“五险一金”至少拥有一种保障项目(社会保障变量),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覆盖率分别是 8.83%、14.08、27.05%和 46.97%,表明学历越高则社会保障的覆盖率也越高。而从社会保障的具体项目来看,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仅有 7.75%的农民工获得养老保险,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接近一半的比例(45.33%)都获得了养老保险;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获得住房公积金保障项目的比例仅为 0.21%,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获得住房公积金保障项目的比重达到 8.45%,后者是前者的 40 倍。从是否接受过职业培训来看,经历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在所有社会保障项目的获取比例上,都大大高于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

表 3 是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情况比较。总体来看,外资企业的社会保障覆盖状况相对较好,而内资企业的社会保障覆盖状况则较差。在外资企业中,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较高的企业类型排序分别为:欧美国家企业、日韩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而内资企业的排序则分别是:国有单位、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例如医疗保险,欧美国家企业、日韩资企业、港澳台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其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分别是 71.36%、62.45%、59.83%和 53.52%;国有单位和集体企业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分别为 48.74%和 29.68%,而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企业,农民工参保的覆盖率仅为 19.07%和 4.93%。由此可见,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率有较

大的差异。

表 2 不同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拥有的社会保障项目比较 (%)

类别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8.83	7.75	7.07	4.95	2.41	1.61	0.21
初中	14.08	12.81	11.59	8.51	4.76	3.18	0.71
高中	27.05	25.54	23.78	17.81	11.85	8.2	2.87
大专及以上	46.97	45.33	43.16	32.82	26.23	19.89	8.45
职业培训							
参加培训	39.64	37.62	35.55	28.73	19.88	13.63	5.20
没有培训	13.29	12.10	11.06	0.73	4.39	3.03	0.70

表 3 不同单位务工农民工的保障状况比较 (%)

单位性质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国有单位	54.33	51.88	48.74	39.20	27.23	17.04	7.05
个体工商户企业	6.77	5.85	4.93	1.73	0.92	0.49	0.07
私营企业	22.54	20.57	19.07	15.27	8.61	5.92	1.11
集体企业	32.91	29.40	29.68	20.66	12.64	9.02	2.78
港澳台企业	64.54	63.71	59.83	57.17	39.89	27.98	6.81
日韩资企业	63.55	63.00	62.45	57.36	47.18	38.65	22.56
欧美国家企业	72.33	72.33	71.36	68.45	40.78	36.41	25.24
中外合资企业	57.44	55.98	53.52	45.82	29.68	22.91	9.70
其他类型企业	5.31	5.12	4.09	2.31	0.88	0.63	0.10

表 4 是不同迁出和迁入地区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状况比较。总体来看,户籍所在地为中部地区或者迁入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其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率都比较低。从迁出地来看,户籍所在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五险一金的所有保障项目方面,不仅大大低于户籍地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而且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覆盖率方面,都低于户籍地为西部地区的农民工。仅仅在住房公积金的覆盖率方面,户籍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与户籍地为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基本持平。从迁入地来看,打工所在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在“五险一金”的所有保障项目方面,不仅大幅度的低于打工所在地为东部地区的农民工,而且低于打工所在地为西部地区的农民工。

表 4 不同迁出迁入地区农民工的保障状况比较 (%)

迁出迁入地区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迁出地							
西部	15.74	13.49	12.99	9.65	5.37	3.31	0.81
中部	13.74	12.82	11.47	8.36	4.72	3.21	0.82
东部	22.63	21.84	19.84	14.75	10.32	7.63	2.60
打工所在地							
西部	11.50	9.72	9.06	5.33	3.30	1.88	0.56
中部	8.68	7.92	6.75	3.49	2.19	1.31	0.29
东部	23.77	22.46	20.82	16.93	10.30	7.42	2.19

三、理论框架与计量模型

社会保障是工人总补偿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取原有城镇居民拥有的各项社会保障待遇,是农民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决策行为。而农民工是否参加各类社会保障项目,则使用随机效用模型

(Random Utility Model, RUM)可以较好地描述和解释这种理性选择行为。随机效用模型由 McFadden 创立(McFadden, 1973:8),随后得到广泛应用(Deaton & Muellbauer, 1980:20; 秦立建、王震, 2014:82)。McFadden 认为,在所有可供选择的类别中,无论个体选取何种类别,则每一个类别对于理性决策的个体都具有不同的效用;而某一类别之所以最终被选择,必然是由于该类别产生了最高的效用。每一个类别的效用可以分解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固定成分(Deterministic Component of Utility),第二部分是随机成分(Random Component of Utility)。固定成分是指可以观察到的影响个体效用的因素;而随机成分是指虽然影响个体的效用,但是无法被观察到的因素。正是这个随机变数导致每一个选项的效用本身都是随机的,进而导致某一因素影响各个选项的效用的大小也是随机变化的。所以,理性的个体不是固定选取某一类别,而是选择某个类别的概率有多少。标准的随机效用模型如式(1)所示。

$$U^a = \beta_a X + \epsilon_a \quad \text{and} \quad U^b = \beta_b X + \epsilon_b \quad (1)$$

式(1)中 U 代表农民工作出某种选择的效用。 X 是影响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获得的因素,包括个体特征、就业特征和迁移特征。个体特征变量包括性别、教育水平、职业培训、婚姻状况;在年龄方面,主要考察新老两代农民工在社会保障的获得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就业特征变量包括月工资、签订合同、单位所有制性质和行业,迁移特征变量包括外出迁移时间、打工城市类型、户籍所在地区和打工所在地区虚拟变量。 β 是待估参数, ϵ 是随机误差项。 a 和 b 分别代表农民工个体拥有社会保障和没有社会保障。

实际观察到的农民工做出选择的类别,其效用一定大于放弃的备选类别。因此,当农民工拥有社会保障项目时,表明 $U^a > U^b$,则赋值个体为 1;当农民工没有社会保障项目时,表示 $U^a \leq U^b$,则赋值个体为 0。因此,假设当农民工有社会保障项目时 $Y=1$,则可以将式(1)转换为概率模型如式(2)。

$$\begin{aligned} \text{Prob}[Y=1 | X] &= \text{Prob}[U^a > U^b] \\ &= \text{Prob}[\beta_a X + \epsilon_a - (\beta_b X + \epsilon_b) > 0 | X] \\ &= \text{Prob}[(\beta_a - \beta_b)X + \epsilon_a - \epsilon_b > 0 | X] \\ &= \text{Prob}[\beta X + \epsilon > 0 | X] \\ &= F[\beta X + \epsilon] \end{aligned} \quad (2)$$

由于本文研究使用的样本量较大,可以假定 $F(\cdot)$ 为正态累积分布函数,因此使用 Probit 模型对上式进行估计。Probit 模型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法。农民工的工资对其参加各类社会保障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社会保障也是总收入的一部分,各类社会保障项目也对农民工的工资产生影响,从而导致社会保障覆盖变量与工资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造成回归结果的有偏估计。为了检验社会保障获得与工资之间的内生性问题,遵循已有文献的思路(王震, 2007:66),本文使用“过去一年您给过老家的钱(物)合计多少元”作为农民工工资的工具变量。这一变量与农民工的工资高度相关,但是对农民工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获取没有显著影响,是一个较为理想的工具变量(Green, 2007:52; Akay, et al., 2013:1;)。如果检验结果表明社会保障覆盖与工资之间存在内生性问题,则使用工具变量 IV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否则应接受普通 Probit 模型的估计结果。

四、实证结果

表 5 是农民工社会保障获得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结果。内生性检验(Wald Test)的结果表明,因变量为社会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方程,存在内生性问题;而因变量为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方程,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在计量回归中,因变量为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方程,使用一般的 Probit 模型(Wald 检验值分别为 0.31 和 0.25);而其他 5 个方程,则使用工具变量的 IVProbit 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单位所有制性质,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都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农民工社会保障获得的问题上,一方面,农民工是被动的接受者;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判断地位逐步增强,农民工已经拥有了一定程度的主动权。

表 5 农民工社会保険覆盖影响因素的计量回归结果

变量名	社会保障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生育保险	住房公积金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IVProbit	Probit	Probit	IVProbit
	系数值	系数值	系数值	系数值	系数值	系数值	系数值
性别	−0.14***	−0.13***	−0.14***	−0.07*	−0.08***	−0.21***	0.17**
新生代	−0.05**	−0.05*	−0.04	−0.01	0.03	0.11***	0.15***
教育程度(对照组:小学及以下)							
初中	0.18***	0.18***	0.17***	0.15***	0.21***	0.21***	0.21*
高中	0.51***	0.54***	0.52***	0.47***	0.55***	0.52***	0.76***
大专及以上	0.74***	0.78***	0.72***	0.62***	0.99***	0.95***	1.26***
培训	0.10***	0.12***	0.10***	0.09***	0.17***	0.13***	0.21***
婚姻状况	0.15***	0.17***	0.15***	0.14***	0.20***	0.34***	0.39***
月工资	0.65***	0.56***	0.58***	0.50**	0.10***	0.06*	−0.83***
合同	1.08***	1.14***	1.13***	1.10***	1.03***	0.91***	0.58***
单位性质(对照组:国有单位)							
个体工商企业	−0.87***	−0.82***	−0.81***	−0.83***	−0.75***	−0.58***	−0.55***
私营企业	−0.53***	−0.50***	−0.51***	−0.41***	−0.35***	−0.25***	−0.49***
集体企业	−0.13*	−0.13	−0.17**	−0.33***	−0.48***	−0.31***	−0.16
港澳台企业	0.04	0.15**	0.11	0.22***	0.35***	0.23***	0.22**
日韩资企业	0.32***	0.37***	0.40***	0.33***	0.73***	0.66***	1.15***
欧美国家企业	0.54***	0.69***	0.72***	0.67***	0.27*	0.52***	0.99***
中外合资企业	−0.16**	−0.10	−0.08	−0.04	0.14*	0.24***	0.17*
其他类型企业	−0.69***	−0.59***	−0.64***	−0.72***	−0.84***	−0.49***	−1.00***
行业(对照组:制造业)							
建筑业	−0.25***	−0.34***	−0.26***	−0.20***	−0.22***	−0.20**	0.16
交通运输通讯业	0.12*	0.08	0.10	0.12*	0.24***	0.06	0.20*
批发零售业	−0.03	−0.04	−0.02	−0.24***	0.11*	−0.11	0.10
住宿餐饮业	0.06	0.02	−0.03	−0.07	0.20***	−0.05	−0.14
社会服务业	0.09**	0.03	0.10**	−0.02	0.11**	−0.02	−0.20*
文教科卫体党政	0.14**	0.07	0.21***	0.05	0.41***	0.08	0.25***
其他行业	0.01	0.03	0.02	−0.07	0.12*	−0.19**	−0.11
外出迁移时间	0.01***	0.02***	0.02***	0.01***	0.02***	0.01***	0.03***
打工城市类型(对照组:地级市城市)							
省会城市	0.11***	0.15***	0.15***	0.17***	−0.44***	−0.38***	−0.33***
县城城市	−0.68***	−0.59***	−0.62***	−0.77***	−0.95***	−1.20***	−1.05***
迁出地(对照组: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0.08***	0.02	0.09***	0.09***	−0.01	−0.06	−0.09
东部地区	0.20***	0.19***	0.20***	0.17***	0.33***	0.36***	0.33***
打工所在地(对照组: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0.07**	0.13***	0.07*	0.14***	0.25***	0.24***	0.14
东部地区	0.12***	0.23***	0.17***	0.47***	0.06	0.01	0.07
常数项	−6.14***	−5.81***	−5.89***	−5.72***	−2.95***	−2.91***	3.30
Log pseudolikelihood	−105046	−102790	−102480	−98687	−20129	−15443	−72084
Pseudo R ²	—	—	—	—	0.31	0.28	—
Wald test	0.00	0.03	0.02	0.07	—	—	0.00

注:(1)***、**和*分别表示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2)Wald test 是外生性检验的 P 值,基于检验结果,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模型使用普通的 Probit 模型,而其他模型则使用 IVProbit 模型,工具变量为“过去一年您给过老家的钱(物)合计多少元”;(3)表中报告了系数估计值,限于篇幅而没有报告标准差等指标,如有需要则请与作者联系。

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有效提高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取能力。在本文的 7 个模型中,一方面,教育程度虚拟变量在所有模型中都表现出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并且绝大部分变量在 1%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另一方面,教育水平越高,则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获取能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比如,相对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在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障的方程里,则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系数值分别是 0.18、0.51 和 0.74;在被解释变量为养老保险的方程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系数值分别是 0.18、0.54 和 0.78;而在被解释变量为住房公积金的方程里,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学历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其系数值分别是 0.21、0.76 和 1.26,不同学历之间的系数值的差距程度更大。职业培训也是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 7 个模型的结果均表明,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在“五险一金”的获取方面均显著优于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拥有较高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农民工,能够较好地掌握现代生产技能,能够更好地适应现代市场环境,有助于用工单位提高劳动生产率 and 市场竞争力。雇佣较高教育人力资本存量的农民工,是用工单位选择员工的重要衡量标准。因此,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增强了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提高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待遇。

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显著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得。社会保障覆盖率最好的企业类型是欧美国家企业,其次为日韩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而覆盖率最差的企业类型是个体工商户企业和私营企业。在 外资企业中,中外合资企业的保障覆盖率相对较差(单项保险项目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不仅低于其他类型的外资企业,而且低于国有单位的保障覆盖率。以只有一种保障待遇为例(被解释变量为社会保障),相对于国有单位,则港澳台企业、日韩资企业、欧美国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变量的系数值分别是 0.04、0.32、0.54 和 -0.16,个体工商户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变量的系数值,则分别是一 0.87、-0.53、-0.13 和 -0.69;而对于养老保险,相对于国有单位,则港澳台企业、日韩资企业、欧美国家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变量的系数值分别是 0.15、0.37、0.69 和 -0.10,个体工商户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变量的系数值,则分别是一 0.82、-0.50、-0.13 和 -0.59。这说明,个体工商户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没有严格执行相应的政府政策,应该将这类企业作为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覆盖“扩面”工程的重点。

其他一些变量的结果也值得关注。性别变量的结果表明,男性的总体社会保障获得状况低于女性,但是住房公积金的获取状况要高于女性。可能的原因是,女性更加关注个人的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问题,而购房则往往被视为男性的责任,所以,男性农民工更加关注住房公积金。老一代农民工享受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的状况好于新生代农民工,而新生代农民工在失业、生育和住房公积金的获取方面优于老一代农民工。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恰逢生育周期;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人群,在城镇地区购房、并享受与原有城镇居民相同的失业保障待遇,被新生代农民工视为“市民化”的重要象征。

签订工作合同的农民工,其“五险一金”的获得状况均显著好于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正向影响农民工的大多数社会保险项目获得,但是负向影响住房公积金保障项目获得。可能的原因是,住房公积金实行单位与个人一比一的扣缴方式,个人收入的扣除数额较大,而本文的工资只是扣除这些款项之后的净收入。农民工迁出地虚拟变量表明,相对于户籍所在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则东部地区农民工在各类保障项目的获取程度均比较高,而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在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项目的获取状况较好。打工所在地虚拟变量的结果显示,东部和西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获取状况均好于在中部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各省份都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迁出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其获取的社会保障状况较差,不利于自身的安全维护,长期来看中部地区劳动力的质量必将趋于下降。中部地区的用工单位,不给予农民工相应的社会保障待遇,其实质则是对劳动力价值的“涸泽而渔”,长期以来,必将无力吸引高质量的劳动力,不利于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五、结论与建议

基于国家卫计委2010年12月进行的全国性大规模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首次全面研究了教育人力资本和企业所有制性质对农民工参加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影响。文章利用工具变量法尝试解决保障项目获得与收入的内生性问题,使用IVProbit模型以及Probit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良好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获取能力。接受学校正规教育的程度越高、经历过职业培训,都能够显著提高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获得水平。第二,就业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各类社会保障项目获得。欧美国家企业、日韩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各项社会保障覆盖率较高,而中外合资企业、个体工商户企业、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为农民工提供的各项社会保障覆盖率较低。第三,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覆盖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相对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则中部地区的用工单位以及迁出地为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总体覆盖水平较低。

为了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覆盖率,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并且提高城市化的质量,本文建议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提高农民工的教育人力资本存量。从短期来看,应该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劳动技能,增强农民工的劳动市场谈判地位。从长期来看,应该加强农村地区的学校正规教育。其次,实施多样化的社会保障缴费政策。农民工群体的构成较为复杂,异质性较强;而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资源获取、科技创新和企业利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实行相同的社会保障缴费政策,则将为农民工以及盈利能力较低的个体工商户企业和私营企业等造成一定的财务压力,不利于提高这类企业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再次,应该有效实现各类社会保障项目手续的跨地区转移接续。农民工的职业转换较为频繁,地域流动性较强,如果各类社会保障项目的手续不能实现异地转移,则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欧盟对跨国迁移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项目实行“分段记录、连续累加、共同负担”的方式(Andrietti,2001:59),是可供借鉴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 [1] 郭菲、张展新(2013). 农民工新政下的流动人口社会保险:来自中国四大城市的证据. 人口研究,5.
- [2] 郭林、熊波(2014).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生活保障机制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
- [3] 郭瑜(2011). 影响农民工参与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因素. 调研世界,42(1).
- [4] 韩俊强(2013). 农民工工伤保险参保行为与城市融合. 社会保障研究,57(4).
- [5] 胡央娣(2013). 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影响因素研究. 统计研究,105(4).
- [6] 孟颖颖(2011). 有限理性的农民工社会保险需求与风险偏好研究. 经济管理,159(10).
- [7] 彭佳芳(2009). 珠三角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实践、问题及对策. 财政研究,65(6).
- [8] 秦立建、王震(2014). 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的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88(5).
- [9] 王冉、盛来运(2008). 中国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中国农村经济,26(9).
- [10] 王震(2007). 乡城流动工人医疗保险覆盖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 中国人口科学,61(5).
- [11] 张国英、吴少龙(2012). 珠三角外来工的社会保险:非正规就业的视角. 中国人口科学,88(4).
-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课题组(2013). 多轨制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转型路径. 经济研究,1.
- [13] 朱玲(2010). 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与可持续研究. 中国人口科学,2.
- [14] A. Akay, et al. (2013). Remittances and Well-being among Rural-to-urban Migrants in China. *Review of Economics of the Household*, 26(7).
- [15] V. Andrietti(2001). Portability of Supplementary Pension Right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Security Review*, 54(1).
- [16] Z. Cheng, et al. (2014). Access to Social Insurance in Urba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ural-urban and Urban-urban Migrants in Beijing. *Habitat International*, 41(2).
- [17] A. Deaton & J. Muellbauer (1980). *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8] W. Green (2007). *Econometric Analysi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 [19] J. Knight & R. Gunatilaka (2010). Great Expectations?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38(1).
- [20] D. McFadden(1973). Conditional Logit Analysis of Qualitative Choice Behavior, in P. Zarembka(eds.), *Frontiers in Economic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21] I. Nielsen, et al. (2007). Migration and the Right to Social Security: Perceptions of Off - farm Migrants' Rights to Social Insurance in China's Jiangsu Province, *China & World Economy*, 15(2).
- [22] R. Smyth, et al. (2009). What Determines Employer Willingness to "Yop Up" Social Insurance: Evidence from Shangha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30(6).
- [23] H. Wang, et al. (2013). Discrimination in Migrant Workers' Welfare Entitlements and Benefits in Urban Labor Market: Findings from a Four - City Study in China,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42(9).

Impact of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and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on Attainment of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Qin Lijia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Yang Qian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Chen Bo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Abstract: This is the first empirically study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and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on the attainment of social security of migrant workers. The data collected by China's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in December 2010 was adopted.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betwe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and wage of migrant was solved by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first of all, the higher level of education, the more capacity of attainment of social security. Secondly, occupation training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migrant workers' ability of attainment of social security. Thirdly, the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affects the migrant workers' coverage of social security. These results indicate that migrant workers are no longer merely passive recipients of social security project. However, they have a certain initiative in access to social security program. Therefore, all kinds of enterprises should be prompted to afford social security projects for the migrant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education and occupation training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capacity of attainment of social security projects could be improved.

Key words: educational human capital; ownership of enterprise; migrant workers; social security

■作者地址：秦立建，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安徽 蚌埠 233030。

Email: qinlj28@163.com。

杨 倩，安徽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陈 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Email: chenbo@drc.gov.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JL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3CGL1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1031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2013T60058)

■责任编辑：叶娟丽

